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解读	唐少杰
【觉醒年代】	草原上的阅读与启蒙——追忆与补记	秦 晓
【往事非烟】	进出炮局监狱纪实（上）	刘 若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报告】

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解读

· 唐少杰 ·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时期的著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所说的“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一般是指毛泽东在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期间亲自写下的专门文稿，这类文稿已收录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一套共计十三册的文稿，只有第十二册、第十三册收录了毛泽东1966年1月至1976年7月的文稿，这两册文稿还包括毛泽东在此期间的部分讲话稿（或部分谈话纪要）、批注、批示、短信、对有关文章文件的修改评语、以毛泽东名义发布的声明和以毛泽东等人名义给外国有关人士发送的电报，以及两首诗（《有所思》、《呈郭老》）等等。本文所说的“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特指毛泽东文革时期亲自写下的、不同于上述讲话稿等等的、篇幅在数百字以上的专门文稿。根据这两册文稿的收录，毛泽东的这类专门文稿共有五篇，这五篇文稿关系到文革的指针、策略、进程、转向、方向等，目录如下：

- 1、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即《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780余字），亦即著名的“五七指示”。
- 2、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1800余字）。
- 3、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490余字）。〔1〕
- 4、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50余字）。
- 5、1970年8月31日《我的一点意见》（780余字）。

已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十三册还没有完整地发表或收录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全部文稿以及全部讲话稿（或谈话纪要）、批示或批注等等，已经发表的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文稿约计560篇（自1966年5月至1976年7月），没有公开的或者至今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的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文稿，数目不详，究竟是多于还是少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文稿，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悬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其每一册的“出版说明”中云：“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

〔2〕例如，这一文稿就没有发表或收录毛泽东1967年8月4日写给江青的信。关于这

封信，只是在有关文革史著作中有所提及，〔3〕据披露，毛泽东的这封信提到了文革初期两个著名的举措：一、“武装左派”，二、群众专政。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这一封信在文革时期和文革之后，都没有公开发表。据悉，这一封信曾在中央碰头会议上，由江青传达过。〔4〕还有，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的“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5〕实际上是没有经过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之一，这些批评是在1976年10月18日之后作为“四人帮”的罪证材料而公布发表的，把它们收录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分必要，非常重要，但与上述“出版说明”的那种说法却有所出入。

因而，根据至今已有的发表情况和资料统计，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亲自写下的著述至少有六篇（不知还有没有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的其他著述）。这种著述的时间分布也十分明显，主要集中在1966年（实际上主要集中在5月至8月），共计4篇，即《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五七指示”）、《给江青的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70年1篇，即《我的一点意见》。由此可见，一方面，毛泽东在1968年至1969年、在1971年至1976年，相对来说，他亲自写下的专门文稿成为“空白”。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文革所有年份的有关批注、评语不重要，例如，1966年5月对后来成为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又如，1968年8月对姚文元关于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领导文革的文章的题目修改和大段补充。另一方面，自1970年之后，毛泽东没有写下什么专门文稿或著述。

下面，对上述五篇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逐一进行简要的评析：

1、“五七指示”。它在严格的时间意义上还不属于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因为文革此时还没有正式爆发，但由于这篇著述对于整个文革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甚至成为文革的社会建设的某种“蓝图”，所以把这一著述归类为毛泽东的文革著述之中，十分合理，理由则不言而喻。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所向往的、憧憬的社会，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呢？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6〕毛泽东所向往的这种社会实质上是与传统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勾画的理想社会相抵触的。这种社会的境界其实正如毛泽东在这一指示所提及的，还停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军事斗争的经验生活层面。毛泽东所确定的“五七指示”精神，为他的文革社会建设勾勒出一个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各自兼学别样而同时功能齐全的乌托邦目标，这与他青年时期在湖南就有的“新村”、“新民”的理想和活动密切相连，〔7〕更与他一生所奉行的具有平均主义取向、民粹主义底色和民本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理念息息相关。邱会作认为，“《五七指示》正是解决全民动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陈伯达起草的《人民日报》当时为了宣传“五七指示”而发表的社论《共产主义宏图》“也正是着力宣传了这个问题”。〔8〕从“五七指示”不难看出毛泽东一以贯之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诸多特性。“五七指示”既与毛泽东1950年代后期的激进的乌托邦理念和他“大跃进”的初衷没有什么差别，也对毛泽东所情有独钟地加以怀念的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大的改观（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幽魂到了文革之际就可能具有了“兵营社会主义”的营盘），只不过是毛泽东把他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推进到了全国全民全社会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无论怎样，“五七指示”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领导文革和实施文革所追求、所建设的新世界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着政治上或权力斗争上的因素，但是它更深刻的意义是其意识形态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

革命相比，文化革命具有最根本的性质。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清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永久地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创建理想社会的问题。‘五七指示’成为‘文化大革命’重要的意识形态依据，就在于它体现毛泽东对新人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是‘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目标。”〔9〕据戚本禹回顾，1966年5月中旬，陈伯达和他等到上海毛泽东住处，负责整理毛泽东的这个“五七指示”、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并起草中共中央下发学习、贯彻和落实毛泽东这一指示的通知，毛泽东说：解放军总后勤部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10〕“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11〕

今天看来，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五七指示”应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成为由托马斯·莫尔（More）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念在文革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实践。从“五七指示”中，不难看出莫尔《乌托邦》、康帕内拉（Campanella）《太阳城》、圣西门（Saint-Simon）《论实业制度》、傅立叶（Fourier）《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欧文（Owen）《新社会观》以及卡贝（Cabet）《伊加利亚旅行记》等等著作取向的影子，不难看出张鲁的“五斗米道”、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大同书》、武者小路实笃“新村规划”等等主张作用的痕迹。〔12〕尽管“五七指示”言简意赅，但它可谓人类乌托邦史上的一部政治代表作。更重要的是，“五七指示”是中国文革十余年历史的一部社会实践“纲领”，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几年里在柬埔寨曾得到了比起中国更加直接具体而又异常惨重的映照或折射。

2、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人们目前对毛泽东文革著述争论颇大、歧义颇多的一篇著述。王年一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的核心和要害。”〔13〕“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的‘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的‘破’的意见。”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14〕孙万国对于这封信的真实性和原创性提出了质疑。〔15〕刘林元的评论很有见地，这封信是毛泽东在文革“决战前的犹豫和不安心态的袒露。”〔16〕但是，王年一下面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17〕在我看来，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没有提及或者没有直接论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

这封信是毛泽东发动和推动文革的一个“秘笈”，可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加以解读。毛泽东对于自己发动和领导类似文革这样的“天下大乱”似乎信心满满而又前瞻后顾，他充分意识到他自己会被左派、右派分别加以利用，但是他的决心已定，“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18〕

毛泽东给自己妻子写下的这封信，可谓“黑话自说”。这封信的原件被销毁而留下了其他人的抄写件，这也说明公开不公开、何时公开、甚至怎样公开这封信都视形势而定。只是到了1972年5月，为了批判林彪，为了表明毛泽东对林彪有“先见之明”，此信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会议文件之一，才得以正式公布。但是，至少有一点很明确，毛泽东给江青写这封信，而不是直接给其当时的“亲密战友”林彪或周恩来等写类似这样的信，畅谈他推动文革的决心、策略、谋划、预想等等，充分表明他对于他的党内同事和同志们已不完全信任了。毛泽东的一番内心话似乎只能直接说给自己的妻子听，而其他人则是在形式上间接听到的或读到的，正如他在酝酿文革之际把江青放出来，把江青置于

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江青就具有了毛泽东所赋予的独一无二的文革角色和无出其右的文革功能。这就有可能造成文革初期独有的某种局面：毛泽东不便说的话，江青来说；毛泽东不便做的事，江青来做。文革初期，人们甚至很难辨别分清文革的某些策略和举措哪些是毛泽东和江青共同决定和实施的，而哪些又是毛泽东和江青各自决定和实施的。这也就表明毛泽东在文革伊始和文革之初在某种意义上真正有可能来告别昔日“右派”分子所批评的“党天下”，趋向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政治夫妻店的“家天下”。总之，在谋划文革、发动文革和推动文革，江青起到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都起不到的作用！

值得提及的一点，一位海外研究文革的朋友曾经问起过我，对于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党委及其领导人被“打倒”，毛泽东本人有什么样的表态？正是在给江青的这封信里，毛泽东在谈及这次文革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后写道：“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19〕毛泽东对于打倒陆平、蒋南翔等人和瓦解北大、清华党委的做法是完全首肯的。这也间接地给文革初期清华大学两派群众论战时有人质疑蒋南翔到底是被“抛”出来的还是被“揪”出来的问题，做出了确凿的回答。如果邱会作后来的回忆是可靠的话，毛泽东在1966年8月4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中，指责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进驻大学镇压学生，错以为陆平、蒋南翔是镇压学生运动而倒台的，“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20〕实际上，陆平、蒋南翔的倒台都是由于文革初期来自北大、清华之外的中共上层政治力量的决定，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问题，至少在1966年6月之际那时的北京乃至中国还不存在上述的学生运动，最多只是极少数学生的不满或批评。

3、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当时，毛泽东的这封信只是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还没有在全党全国传达，但是，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内的北京红卫兵不久得知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在全国不胫而走。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支持造反，显然也是为了要天下大乱。”〔21〕

此信是毛泽东在看到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两篇文章而写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不仅是文革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而且是文革最早的青年学生造反组织和造反运动的开路先锋。他们所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受到了进驻清华附中的工作组的批评。经江青转交这两篇文章，毛泽东对于红卫兵及其精神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红卫兵精神”就是上述两篇文章所强调的而很快就成为文革伊始的宗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22〕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23〕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应用的这后一段“造反有理”的话出自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军民纪念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24〕毛泽东独特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造反文化结合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仿佛就是“造反”（Revolt, Rebel, Rebellion）！在初期，文革的真髓简直就是“造反”！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遇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统的、按部就班的、党的逐级而又垂直领导的模式的“阻力”，遇到了党内传统的干部秩序和运作机制的某种“遏制”，毛泽东以三个“很”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极大不满，即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干部对于文革的发动群众和深入开展，“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25〕毛泽东始料不及而又喜出望外的是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给他、给文革提供一大批把文革推向全国全民全社会的、年龄差不多与新中国同龄的（近20岁）、正处在人生最旺盛的生理期和最活跃的心理期而横空出世、造反于天下的“天兵天将”。

毛泽东这封信不仅对清华大学附属中的红卫兵给予赞许，还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彭小蒙领导的红旗战斗小组给予肯定，他在信中向红卫兵所强调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实际上正是红卫兵所做不到的固有弊端。红卫兵当时所要进行的首要任务不是什么团结的问题，而是冲向更大的天地，打打杀杀，开创出文革的新天地。团结的问题根本不是红卫兵所能解决或真正做到的问题。毛泽东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似乎一语成谶，红卫兵几乎横扫了一切而最终也横扫了自己，走向了自我异化的不归之路。红卫兵的发展和结局其实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一问题风马牛不相及。

毛泽东的这封信还是毛泽东随后不久在北京前后八次接见来自各地、共计约1300多万红卫兵、青年学生的活动的缘起而相关的一条脉络，也是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正式登上文革舞台的旗幡，更是使文革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部门及单位、各个地区及角落直至青少年以上的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红卫兵运动得以成势的大纛！以毛泽东的这封信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为标志，毛泽东不仅仅成为当时的红卫兵所赞誉的“我们红卫兵的最高红司令”，而且还是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发动者和引导者。

4、《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是他与刘少奇决裂的标志，也是他的文革政治与当时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文革政治区别开来的标记。由这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26〕这张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的大字报，在当时并没有作为真正的大字报张贴出来，而只是毛泽东以大字报的文体发射出了“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文革政策和文革举措的重磅炮弹，致使文革在形式上成为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由中共党的领导转变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27〕的“大革命”，已不可阻挡，不可逆转。如果说毛泽东在几天前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是他要唤出文革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政治推土机”，那么这张大字报则是毛泽东要更大更广更高地掀起文革群众运动的“排头浪”。

在王年一看来，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28〕这值得商榷，因为毛泽东只是与刘少奇、邓小平等部分第一线领导人决裂。卜伟华也说：“这张大字表标志着毛泽东正式与刘少奇的决裂，标志着毛泽东正式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决裂。”〔29〕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是错的，因为毛泽东毕竟没有与周恩来等决裂。“炮打”一词在文革初期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政治用词，它不同于“打倒”，它和文革初期所用的政治上的“火烧”一词比较接近。在这张大字报发表之际，刘少奇、邓小平还没有立即被打倒，只是政治上的失势，他们是在1966年10月之后被打倒。

这张大字报在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所有著述中，简练如洗，气势非凡。毛泽东显然充分考虑到了这张大字报是要在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众多干部面前公布昭示的，这张大字报短短250余字的行文，几乎一气呵成，矛头锐指，所向披靡，势不可挡。这张大字报所要追求的效应就是要使被毛泽东所“炮打”的刘少奇、邓小平所谓“司令部”似乎只有招架之势，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毛泽东文革初期的个人专断和个人极权又一次得以淋漓尽致的显现。

这张大字报的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主要在于它确定了毛泽东文革所要指向的最大的对象，它第一次表明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层有一个与毛泽东本人格格不入的所谓“司令部”，因而，由这张大字报所开启的毛泽东的文革运作和文革逻辑，打倒、整治、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就浑然成势，势在必行。这张大字报似乎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尽管没有张贴出去的大字报那种形式），在文革整个历史上可谓力敌千钧，并且在文革伊始第一次直接导致了中共中央第一领导人的改换和重组。

5、《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以批判、斥责文革初期的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这篇檄文般的著述，扭转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进程，还在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打下了后来难以修补的“楔子”，也直接反映出文革中期中共中央领导层政治内讧、内乱的全面开始。毛泽东写于1970年8月31日的《我的一点意见》，周恩来说这是毛泽东在当时的庐山会议上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30）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可能促成毛泽东当时采取举措的重要细节，就是毛泽东在8月30日把在北京值守的黄永胜召到庐山谈话，他对黄永胜的态度大为失望，即黄永胜当时直言不讳地指责张春桥、批评江青，这就使得“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31）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故意夸大其词，敲山震虎，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于陈伯达的数落和痛斥无以复加，“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32）这种说法罔顾事实。邱会作后来回忆到，“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主席说他和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没有配合。’周还举出例子。与其说周恩来为人厚道，还不如说他是在为毛泽东‘打圆场’”。（33）陈伯达本人似乎把《我的一点意见》当成了“毛泽东的‘第二张大字报’”，（34）“毛泽东这篇短短七百字的文章，是毛泽东生命最后十年中亲笔所写的最长文字。文章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极尽夸张之能事；初一看，金刚怒目，气冲牛斗；仔分析，处处矛盾，似是而非；与第一张大字报相比，确有异曲同工、珠联璧合之妙，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特点，很值得研究。”（35）

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点名吴法宪，把吴法宪与陈伯达放在一起加以指责，经过周恩来的解释，毛泽东把吴法宪的名字删掉。但是，周恩来还是要吴法宪检讨，为的是保护“副帅”林彪。（36）在写作《我的一点意见》之际，毛泽东的策略是牺牲陈伯达，敲打吴法宪等人，暂时稳住林彪。吴法宪认为，“这次我们打了个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37）实际上，对林彪、吴法宪等人来说，也是政治上致命的一次。（38）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谈及所谓的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的不同、唯物论反映论与唯心论先验论的对立，确有实用主义的做法之嫌，这种谈及远远不是指向文革初期广为流行的、在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而是站在所谓“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判处了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的政治死刑。“《我的一点意见》是严厉批判陈伯达有‘野心’，为什么要‘揪出’陈伯达，陈伯达的‘野心’是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这篇文献稳住了林彪，而林彪绝不会不有感于心。”（39）由《我的一点意见》为基点，从陈伯达的倒台到次年林彪的灭亡，就有了特定的历史连贯性和具体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初看起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决不容许未经他认可由林彪等众人围攻张春桥，归根结底，毛泽东决不允许由那种力图打倒张春桥的做法来动摇文革直至否定文革。在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与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人集团之间，毛泽东选择后者、遗弃前者致使文革不可逆转地全盘衰败。

通过《我的一点意见》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像陈伯达这样的自己的昔日秘书，这种作为毛泽东过去诸多文章和若干思想的重要起草者、编纂者、表述者，这位文革初期作为毛泽东文革“军机处”（即“中央文革小组”）的“领班”，为了稳住、进而为了打乱林彪及其军人集团，弃之如敝屣，致使陈伯达成为毛泽东与林彪“过招”的第一个政治“殉葬品”。

综上所述，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这五篇著述各自在文革的历史过程和特定阶段具有独特的取向和意义。显而易见，主要集中于文革最初几年写成的这些著述对于文革的开展和演变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说来，“五七指示”是文革伊始的社会建设的“勾画图”；给“江青的信”仿佛是全力掀起文革狂澜的“投名状”；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是对文革生力军和突击队发出的“动员令”；《炮打司令部》是直指文革最大的整肃对象的“进军令”；《我的一点意见》是毛泽东开始疏远并敲打林彪军人集团而庇护江青文人集团的“界标”，也是文革中期中共中央领导层有所裂变的“分水岭”。除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文革时期的四篇著述之间有一定的、相对内在的关联性或互动性，即这四篇著述集中于发动文革、实施文革的谋划、策略、布局和推动等问题。

毛泽东文革著述的发表或公布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些著述在写出之后，往往不是立刻在很大的范围公之于众，而是根据文革的特殊形势和不同要求，或者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式内部传达，或者以《人民日报》等报刊社论精神的方式加以宣传，或者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之后以“马后炮”的方式在党内逐级传达，或者由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以口头传达的方式告知相关的人员，等等。毛泽东文革著述具有的这种写出之后的间接公布或这些著述相对滞后的公开发表等特征，给人们应用和“发挥”这些著述带来了“解释”、“再解释”、“过度解释”乃至“创新解释”的契机和可能。尤其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那封信（当时见过或读过这封信的仅有数人），只是在1972年5月才首次公布，这就必然带来了毛泽东文革著述的写出与这些著述在时间过程、空间渠道的传播所出现的信息的质量互变的事实，必然带来了人们理解这些信息所发生的嬗变的现象。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著述远不如他在1966年之前特别是在1920年代至1950年代那样广泛、丰富、具体了，甚至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著作已没有什么宏篇大论了，字数最短的《炮打司令部》仅有250余字，字数最多的一篇著述还是给江青的信，也不到2000字。总之，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是毛泽东文革时期精神活动的一种“写照”。

质言之，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没有写出关于文革问题的专门论著，亦即没有撰写任何关于文革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没有写出关于文革的理论著作。上述的几篇著述对于文革来说更多的是策略性的、应付性的和工具性的。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他对文革的思想指引和精神主导，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对于文革具有特定意义的文件、社论、专文、报告或讲话稿的修改或批注体现出来的。其中，比较著名而对文革的进程具有相当重要作用的有：1966年4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即对“五·一六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40）1968年8月，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41）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42）1971年8月—9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43）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44）等等。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能力的退化是非常明显的。这既是由于文革初期毛泽东毕竟年过古稀、年届耄耋，更有可能是因为在文革之际的地位和权威，毛泽东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为文革的诸多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著述和思想论证。他主要通过其麾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御用文人或写作班子（例如，“梁校”大批判组）等等来传达他的文革主张和文革理念，这就使得他的文革著述活动显得七零八落，短小简单，具有了随机应变、有感而发、因时应付等等特点。毛泽东的文革著述已经没有什么系统性、完整性、严谨性，甚至没有什么思想的自洽和逻辑的严密。毛泽东文革时期旨在全面推行和深化他的文革实践，因而他的文革著述

直至他的文革理论与这种实践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甚至在文革时期就有了不可弥补的裂隙。

毋庸置疑，迄今为止发表的毛泽东文革时期的全部文稿已经没有了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发表的全部著作中的许多特色或众多文彩了，甚至把毛泽东生前就已发表、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与毛泽东去世二十年后才发表、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十三册加以比较，对于毛泽东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著述活动的诸多特点，就可一目了然，豁然释怀。毛泽东时期文革著述在毛泽东一生的著作史上占据着颇为异常的地位，并具有了格外反常的意义。这类著述在毛泽东一生的著作中数量不足百分之一，字数只有几千字，但是这类著述成为毛泽东晚年的文革风雨历程的仅有的著述“标记”。实际上，自1958年之后（特别是进入文革之后），毛泽东的著述就与他之前的著述在数量、范围、题材和内容上几乎不可相提并论或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有时设问，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这场横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大革命”，在理论上、在著述上，有没有什么可真正建树的东西呢？

例如，构成文革意识形态主体鼎足之势的三大理论“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毛泽东就没有什么直接来自他本人的系统的、甚至是像样的论述，他更多的是对他手下的御用文人和写作班子的相关文章的修改和批注来加以发挥和凸显他的文革主张和文革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或者在某些后人看来，他没有必要直接从事这些理论的阐释或加工，但是这些理论的确切内涵、内在联结和取向转化等等，在毛泽东那里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而在实践上的运用，更是谬误重重，弊端丛生。换言之，毛泽东的文革著述和文革理论比较起他的文革历史和文革实践，真可谓一抔土与一座山之比。

显然，由于毛泽东本人在文革时期没有一本或者一篇专门的文革著述，由此，也就不难从某个侧面映现出文革的精神生机之劣、思想活力之低和理论创造之差。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和文革思想与整个文革历史的实践及其结局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可弥补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张力（tension），包括上述文革著述映现出的毛泽东文革主张和文革思想在内的整个文革精神活动和精神世界，则是十分贫瘠、单调、困乏和艰难，更不用说异常独断、专制了。总之，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的今天，重新解读毛泽东的文革上述著述，可以断定，它们既是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活标本”，也是文革精神史的“活化石”。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5页此信手迹照片下面标明的时间是1966年7月31日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十二册第87—88页全文发表的此信，经过修改，毛泽东向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交此信所标明写作的时间是8月1日。此信实际上已在7月31日写出。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至第十三册，每册第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至1998年。

3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第576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另注：见到过此信全文复印件的卜伟华先生告知我，毛泽东这封用铅笔写出的信，篇幅也只有两、三页，引自卜伟华2016年4月1日致唐少杰的电子信件。另据高文谦披露：1967年，“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

下去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2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

4 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第1012—101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94—39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7 参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第406—41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参见逢先知主编、冯蕙等副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第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8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第34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实际上，《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发表的社论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该社论用黑体字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勾勒出了一幅文革按照“五七指示”所要奋斗的前景：“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62页，内部发行，北京，1988年。

9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第208页，台北，洪业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

10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第397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11 同上，第401页。

12 参见陈伯达的说法，同上，第399页。

1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 同上，第2页。

15 Warren Sun, “Half-Truths and Half Fake in the making of Mao’s letter to Jiang Qing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办的“写毛泽东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之一，2013年10月25日。

16 刘林元：《决战前的犹豫和不安心态的袒露——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解读》，《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1995年第11期第24页至第31页。

1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5页，内部发行，北京，1988年。

19 同上，第56页。

20 转引自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第444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2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2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2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65页，内部发行，北京，1988年。

23 清华大的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同上，第66页。

24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以及这一名言没有收录到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

- 25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73页，内部发行，北京，1988年。
- 2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27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73页，内部发行，北京，1988年。
- 2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29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第194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10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31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第718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 32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476页，内部发行，1988年。
- 33 程光著：《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487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4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第391页，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35 同上，第393页。
- 36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11页，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另可参见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第719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 37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17页，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38 按照吴法宪的说法：“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参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23页，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按照邱会作的说法：“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对林彪发脾气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问题。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之后，林彪不能独吞果实。”参见《邱会作回忆录》（下），第810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5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 3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0—4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41 同上，第526—532页。
-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63—1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43 同上，第242—250页。
- 44 同上，第486—490页。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  
【觉醒年代】

草原上的阅读与启蒙——追忆与补记

· 秦 晓 ·

2017年北京的初冬，几位年过古稀的内蒙草原知青在一家餐馆小聚，商谈当年草原生活的追忆和史料整理。说起来是50年前的事了，但似觉得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人是物非”。因为不论发生了多少变化，每个人心中都存着那段时光的记忆。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未能逃脱这场灾难，但有幸于1968年后远离政治中心，在内蒙牧区茫茫草原上和淳朴的牧民一起生活。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知青，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真实的。生活在常态中，思想也突然失去惯性，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如浮云般渐渐散去，滋生起来的是疑惑和对疑惑的求解。

新的认知发生于对从未质疑过的“公理”的质疑。我当年看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书中有一句话使我“顿悟”：“人的一生从幼儿时代就被灌输各种谎言，成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那些谎言统统呕吐出来。”当然，呕吐没那么简单、痛快，每次“顿悟”后又陷入新的迷茫，这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与旧我断裂、新我诞生的生死之变，走出黑暗的启蒙之旅。

启蒙发端于黑暗压抑中幻想的破灭，起步于阅读，贯穿于诘问、思考和交流。在草原上我曾给朋友写过两封信，信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的片断。

第一封是1968年刚到草原，和“插友”彻夜讨论读书，涉及思想、哲学、历史、文学诸多领域，虽然都不太着调，但每个人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把这个讨论写成书信传递给北京的同学、朋友和家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第二封信是我1972年离开草原后写给仍在草原上的李三友，信中讲述了我的觉醒，对毛神化的破除，我在信中说：“毛的思想体系，我要以《实践论》为起点重新审视”。

第一封信未能保存下来，第二封信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为了生存烧掉了。50年后的今天，可以回忆起当年觉醒的状态，但语言和文字再也找不回来了。

回到当年的阅读，其实能找到的书不多。记得去草原前到董志雄同学家，他父亲是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文学家董秋斯，当时已过世，想借几本书。志雄说我父亲读过的书多有眉批，我们家规定不外借，不过我们是老同学，只要保证还，可以借。我们看了董老的书屋，翻了几本，书上确有他读书时留下的眉批，在大师手稿面前，我们都失去了勇气，一本也不敢借。

前面提到《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本书是我找李立群阿姨借的，李阿姨是高岗的夫人，当时在北图工作，北图一般只能去阅读，不外借。李阿姨和父母熟，常到我家，我就斗胆要她帮我借出来，她一开始拒绝，后来可能被我感动了，就答应下来。我在草原看完后，回北京时就还给了她。阅读中能理解的也很有限，但出于对知识和人文精神的饥渴，读的很投入，也不乏启迪和获取对现实的批判力。

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是从美好的理想主义，一步步走入宗教式意识形态的封闭世界，走出乌托邦或解构乌托邦其实是一个回归常识和普世价值的过程，常识为普世价值提供了经验的来源并赋予它正当性。这里说的常识不是自然科学的范畴，是社会学范畴，即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我们长期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则以阶级属性重新定义真、善、美，以替代常识。

当时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是不是马克思理论构建的产物？记得刘进、大平建议读马恩经典，探究老祖宗的思想真谛，检验和回答现实中的困惑和质疑。后来军代表说为什么不读毛选，而要读马的书，试图阻止我们的探索，但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马恩经典。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有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历史观或社会学范式，在去草原前和在内蒙古读过《托洛斯基传》，讲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及对斯大林的批判；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异化、变质的某种必然性；罗斯托的《工业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人宣言》，他同马克思一样，也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方法论，但得出与马不同的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在他的体系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仍处于工业化未完成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已进入高消费的社会阶段，两者对民众的福利和自由有较大差距。

后来才知道，与马并列的社会学范式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相关的书籍还有一些，书名和作者记不住了，比如有一本是美国驻苏记者写的，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未真正废除私有制，只是从占用变为控制，揭示了这种制度的深层问题。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掩盖和压抑了对人性、对人文精神的认识，这个认识的重新发现首先是通过文学精典的阅读开始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描述了变动社会中两代人深厚情感和不同道路选择的交织与碰撞，我由此想到我和父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勃朗特的《简爱》写出了爱情的力量，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使我震撼。契科夫书中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尴尬，托尔斯泰和雨果书中大时代中人的命运，苏联解冻文学对黑暗的揭示都直抵人性的善恶。

还读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带星星的火车票》（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我们习惯了俄罗斯作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方式，而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完全是另一种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读下来焕然一新。这表明范式，包括其它领域，不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是不同时代的特征。

找到文学精典的根和主脉，如荷马、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及加缪等的后现代作品，是后来的事了。

在草原上又重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多是在放羊时，席地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读的，旁边是静静的羊群，和书中的情景有感应，读的很细。放下书，想的问题是葛利高利这个英雄人物是为谁而战？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经历过的红卫兵时代是不是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只是当年草原生活中一点零碎的阅读回忆和补记，它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最终走出乌托邦埋下了种子。

毛姆说大部分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是感性层面的愉悦，人生意义的启迪是潜移默化的。为了得到真谛而去读，其实很功利，会失去对美的感觉。草原上的阅读是非常时代的现

象。可悲的是这个时代太漫长了。希望我们的子孙能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中回归阅读的常态，从中感受愉悦。

□ 来源：微信公号《熊窝2》

~~~~~  
【往事非烟】

进出炮局监狱纪实（上）

• 刘 若 •

一、入狱

1976年5月5日晚上十点多送走几位同学，刚刚静下来，忽然有人敲门，会是谁呢？

一开门，两位中年男子直奔屋内，其中一位开口便说：“跟我走一趟！”那命令口吻，那不看你一眼却在房间里四处巡视，其敏捷、雷厉风行的动作，使我想起这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毛某。他曾在工厂里审问过我，给我留下许多疑团，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今天就来宿舍抓我。

“我不走。”我本能地反应。

“不行，必须走！”

“我身体不好，休息一夜，明天早上我自己主动去。”

“不行，马上走！”他咄咄逼人。

“好吧，走就走！”我毫不在乎地说，又补了一句：“先让我上趟厕所。”

“去吧。”他倒很痛快。

我顺手从桌上抄了一张纸，这是雅周弟弟最近写的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在厕所里默默地读了两遍，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走了。回到宿舍关好窗锁好门，顺从地随他们下了楼，走出宿舍小院，心想：这么黑了，他们不怕我在公共汽车上逃跑吗？万万没想到的是，等着我的是一辆乳白色小轿车，今生今世这可是第一次坐轿车啊。黑暗中两位白衣女警站在车旁，我先上了车，她俩一边一个坐下。讨厌这多余的紧张，对于她们的反感冲淡了第一次坐轿车的感觉和第一次见到女警的好奇心。

头痛，顾不上体会轿车的新鲜与注意行车路线，拐过北郊市场，便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了，任凭命运安排。车在黑暗中行驶，拐了好几个弯忽然停下来。下了车，感觉这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子。

“几个人？”院子里的人问。

“一个。”毛某回答。

院子里黑黑的。下了车，穿过一个大厅，随后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两位女警跟进来问我带了什么东西马上交出来。我拿出一支铅笔，是在宿舍临走前悄悄从桌上抓的，心想在监狱里可能会写点什么，没想到一开始幻想就破灭了。她们又问：“有没有钥匙？”

“有。”

“交出来！”她们中的一个命令道。我斜视看了她一眼，样子很凶。我手插在衣袋里就是不交。这个女警吼起来：“交出来！交出来！马上交出来！”

我生气了，说了声：“交就交！”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啪”地扔了出去，甩在对面的墙角下。

她们火了，大声训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找挨揍？”“老实点！”“拣起来！”？

我说：“铅笔我都不该交。”

我拾起钥匙，又装回自己的衣兜里。

这可把她们气坏了，大声地喊叫着，拉开架势要动手。忽然有人进来，是毛某，他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她们向他告状。毛某问我：“你这是什么态度？”迟疑片刻后，我看着地面，反问他：“我还不算是敌我矛盾吧？”

“没人说你是敌我矛盾，你别瞎想。”他没迟疑。

“那为什么要收我的钥匙？”我气愤中带些委屈。

短暂的间歇后他说：“谁要收了？人家是要检查检查嘛，谁收你钥匙了！检查检查还不许吗？”随后一转身，一挥手，说：“走，走！”

隔着衣服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瞧了瞧那位很凶的女警，我有些许的得意，跟着毛某走了出来。

他是一位大约四十几岁的男子，中等身材，可能是个头目。我在揣摩他的心态，他的回答太出乎意料了。没有收我的钥匙，没有训斥，就连他说的“检查，检查”也没进行。他怎么会想出用“检查，检查”来打圆场呢？他还肯定地说我不是敌我矛盾，那两个女警对这一切又会有何想法？

到了另一个房间，不知下一步棋怎么走，进来一个人让我去领东西。来到一间小屋，有许多鞋子，破旧的线毯和一堆脏被。看了好一会儿下不去手，太脏了！不知多少人用过，怎么往身上盖呢？站在那里直发愁。但是想想，冷恐怕是更难以忍受的。便顺手拿了一条被子，一条毯子回原来的屋。

二、第一次受审

回去后，让我一个人在那小房间里足足呆了十多分钟，来人叫我出去，拐弯抹角到了有一排排房子的地方，带我走进一间。灯光下还是可以看出是“第34室”，这就是审讯室吧。两张桌子，三把椅子是毛某与两位女警用的；门旁角落里一个凳子，自然就是留给被审问者的了，我不请自坐。

毛某开始说：“你要是早说清楚了就没有今天。你今天说了那份‘总理遗言’到底是从哪来的，明天就送你回去。”

“我传抄的不是你们要追查的那份。”我所答非所问。

“你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市委？”

“我相信，但你们追查的是另一份，因为我这份不反动。”

“我还用重新给你讲为什么反动吗？”

“不用，但我认为北京市文件追查的那份反毛主席，还说再也不要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等等。总理不会这么表态的，制造者太没水平了。你们去追查那份好了。”

“你从什么地方听说有那份的？”

“我们宿舍门口的小食店。”

“你要明白敌人就是要利用总理威信来阻挠批邓运动。”

“那敌人也太愚蠢了。”

“敌人就是愚蠢的。”

“何必伪造个遗言呐，这也太笨了，没必要吗。”

“好吧，你这样下去问题就严重了，认识总提不高的话性质可就变了。”他要转向了。

“你是说就变成敌我矛盾了？那我就是阶级敌人了？”

“是的，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交待出遗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吧。”

“您有100%把握追查的就是我那份？”我改变了对策。

“200%！”

“那好吧，我讲，我那份是从北广阅览室拣的。”

“记上，记上。”毛某对一位女警说，接着又问：

“哪天拣的？”

“3月5日晚上。”

“阅览室什么地方？”

“76年1月《文汇报》的报夹里。”

“当时周围有人吗？”

“有许多人，阅览室里满满的，三四十人总是有的。”

“有你认识的人吗？”

没有，我已经不在那个厂了，所以谁也不认识。”

“不可能一个也不认识吧，总有熟悉一些的吧？”

“你要是非让我说出个人来，我也可以做到。”

“你说！”

“比如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工程师，他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了。而且我不记得那天他在。但是你非让我说出个人来，那我就说他好了。”

“你态度要老实，我们是要调查的。”他是很温和地说的，又看了看女警的记录，接着问：“那么我问你：那以后你又向别人讲过遗言吗？”

“没有。”

“我可要提醒你，在你们工厂里你说的，我们还没有忘记，你还记得吗？”

“记不清了。”

“那好，现在我们给你放录音。”

桌上摆着一个录放机，按键一按，开始便是我的声音：

“我是从火车站拣的。”

“什么时间？”毛问。

“3月5日”……

其实不用他放录音，那一过程我脑子里不时地在回放：

4月16日厂保卫组把我找去，问“周总理遗言”是从哪儿来的。因为风声早已传出，我有点紧张，支支吾吾。他们让我回去想想以后再找我。

周日孙蓬一来了，他让我到附近公园里走走。我到了公园转了好一阵子他才走来说，他一直在后边观察，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不过又说：“今后你一定要小心些，少和人来往。”他还帮我出主意：“你就说‘总理遗言’是从门口小食店拣的，不好，还是说火车站拣的吧。”又教我如何编造细节。我俩一问一答地试演了两遍，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勇气。

当厂保卫组又把我找去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毛某也在座。厂保卫组的人纷纷指责我，过了好一阵子，毛某一只手拿着烟卷在另一只手上不停地嗑着，一边平静地说：“刘××，那份所谓的总理遗言，就算是你从火车站拣来的，你讲讲你拣到时的想法。后来传达市委电话指示，又发放了市委文件，指出所谓的‘总理遗言’是反动谣言。在这一过程中，你都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可以讲讲？”

“可以，我还可以讲得更远些，从总理去世讲起吧。”我停顿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声音有些哽咽。“总理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总理，我非常难过，我们国家正是因为有总理才免受许多灾难。我热爱总理，十分怀念总理。”我讲不下去了，没想到他没有打断我，而且当我讲到总理去世时，毛某咄咄逼人的眼神回避了，身子也转了过去，低着头静静地听。我不是在交待问题，而是倾吐着内心的悲痛与愤恨：“有人文革一开始就想把总理打倒，他们像疯狗咬人一样地大造舆论。可以坦率地说，如果你们宣布总理有了问题，要打倒；那我自首我是个反革命，因为我绝对不会反总理。”

“你接着说。”毛某说。

“我刚刚拣到这份‘遗言’时如获至宝，当时就抄了一份。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抄的。……”又讲不下去了。“好，你很坦率，这很好。我可以告诉你，不仅你一个人怀念总理，全国人民都很怀念总理。”没想到毛某是这样接我的话，语气很沉重。停顿了片刻后才抬起头说：“但是你要清楚，这份所谓的‘遗言’是伪造的，是反动的。你还是要说出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已经说过了，是从火车站拣的。”

“我们不相信你是从火车站拣的，你应该老老实实讲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没想到毛某也怀念总理，并真诚地表达。对他的敌对，反感情绪减退了，不想再演下去，索性直言说：“我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他紧跟着问。

“我没有来得及通知送我遗言的人，在没有通知他之前，无论如何我不会说出他来。”

“你孔老二的东西还不少，很讲义气。”

“是的，人各有志。不过现在孔老二也被批判了呀。”

“你这样是错误的！”“你想帮敌人的忙？”“你想通风报信儿？”“你必须如实交待！”……厂保卫组的几个人的声音。

“通风报信有什么错？你们不就是要追查制造者吗！”我反驳他们。

“你放老实点！”“你这是错误的。”“你老实交待！”厂保卫组的几个人嗓音高高的。毛某打断了他们，接着对我说：

“你应该尽快说出是谁给你的。我们可以给你时间考虑转变思想，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你回去好好想想，想通后立即找厂保卫组，讲出来到底是谁给你的所谓遗言。”就此结束了在工厂里对我的盘问。

录放机停止了播放。我也从回忆中抽离出来。接着毛某不紧不慢地说：“你听到了？你好好想想，还是尽早说出是谁给你的。还是那句话，说了，马上就放你回去。说吧。”

“北广阅览室！”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说出是谁给你的呢？”毛某问。

“这东西，也就两张纸，可以是人给的，也可以是在什么地方拣的。所以我说出一个人，或是说出一个地点都行。难道不是吗？”

对于我的回答，毛某没有指责，也没有挑明我过去说了什么，而是转了个话题，他问：“对于所谓的总理遗言你都背下来了？”

“过去背下来了，现在全忘了。”

“什么？前几天在厂里你还说全背下来了，怎么这么几天就全忘了？”

“写在纸上要上交，要销毁；如果记在我的脑子里，岂不是要我的脑袋。哼，哼。”可能是最后的这两声“哼哼”刺激了他们。

“你严肃点！”毛某说。

“你老实点，别嘻皮笑脸的！”很凶的一位女警仗势欺人。

“你懂什么？”我蔑视她，一边说着脚不停地在地上蹭。

“你脚别动了！老实点！……”又是那个女警尖刻地吼。

啪啦，啪啦。我动的更厉害，她和我吵起来。毛走到我面前：“你这是什么态度？”

“您审问我，您问一句我答一句。您耐心做我工作，我没有态度不好。她什么态度？”我气愤地盯着那位女警。这倒见效，毛某马上回到自己座位上，当然少不了说我几句。

两个多小时后，他们也困了，让我回去想想，明天再继续交待。其实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半了。

我提出想多拿条被子，他们说没有了，我回到了牢房。

三、牢房的一天一夜

我努力想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首先，屋内灯的开关在外边，也就是说开关灯的权利不在我手里。我喊了一声“关灯！”没动静。只好亮着灯睡吧，自嘲：从此没有了“黑夜”。

听见斜对面又带来了一个人，好像还让他把衣服全部脱光，这人犯了什么罪？

因为冷，我老要上厕所，总得去敲门。每次来人带我到楼道拐弯处“方便”。去了几次以后，他们干脆给我换了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大牢房，而且是木板地，房内还有个便坑。我已经很满足了。正想享用这个大房间时，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位长者，他让我再去拿铺盖，我真有些喜出望外。跟他来到另一个放物品的房间，当时已经不想脏不脏了，拿了两条毯子就走。这位老人家说：“再拿一条。”我又拿了一条。刚要走又听见：“再拿一条吧。”……此时我感动极了，心里暖暖的。我在想：这老头真好！没想到监狱里的人也有慈悲心。我一共拿了五条，高高兴兴抱回我的牢房，开始布置我的家园。在角落里铺了三条毯子，准备盖一床被子一条毯子，挑了条干净些的当枕头。一切布置停当准备睡，可是看着这些铺的盖的，怎么也不想躺下去。不仅仅是脏，更令人恶心的是有一股霉味。怎么办呢？没法子呀，一咬牙，一闭眼，啪哒一躺，睡觉！我得睡觉，一定要睡好觉。明天，谁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明天。

睡吧，好好地睡吧。似乎命运有意捉弄我。小便后想用水冲一下，而这个便池很特别，水笼头口不是朝下而是朝上。蹲下去，手钩到水笼头用力一拧，水“呼呼”地喷了出来，弄得我满身是水。觉，是没法睡了，真晦气。抬头窗外，黑黑的夜；转脸房内，空空荡荡，角落里一堆破旧被褥；回顾自己，一身湿露露的衣服，一脸的愁容，满脑子的沮丧。但是清醒地意识到第一位的还是睡觉，睡，必须睡！但是被子盖上吧，衣服是湿的；不盖吧，冷。干脆起来先把衣服弄弄干。不住地上下拍打，摩擦，心里念着：水快地蒸发，衣服快地干吧！折腾了大半夜，不知何时迷迷糊糊睡着了。

清晨听见吵闹声，是隔壁牢房的几个女犯吵架，又哭又闹又骂。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她用了我的肥皂。”“谁用你的了？你骗人！”“她踢了我一脚。”“你不要脸。”“谁也别想欺负谁！”“班长，我要换房！”……还不时地喊“报告班长！”后来可能是班长去

了，她们争着告状，提要求。听出来其中一位是去年就关在这里，不知道是些什么人，犯了什么罪，我怎么会和她们关在一起！

忽然又传来“喇啦啦，喇啦啦”的声音，旁边的吵闹一下子也止住了，鸦雀无声。“喇啦啦，喇啦啦”又响了起来，是从斜对面牢房发出来的。这声音只在电影中听到过，是敌人铐在革命者身上的脚镣声。而现在这是什么人？当然不是革命者了。他犯了什么罪？噢，可能是杀人犯吧。这时不禁在想这是北京的哪个监狱？关的都是些什么人？

我聆听着吵架的、抖铐的、扣门的、以及过往看守们的细声细语以及脚步声，……外边还有鸟叫，只是没有歌声。我在想是不是我可以小声唱唱？唱什么？《义勇军进行曲》，太亢奋了。《白毛女》，太悠扬了……有了，是小学演过的小歌舞，（输入曲谱太麻烦，以后再说吧。）很忧伤。

已经是清晨了，起“床”吧。躺在地铺上，不想起来，翻了个身，下意识回忆：

1月9日听到周总理去逝的消息，全家团聚却没有丝毫喜悦，顽皮的小弟弟变得也格外听话。9日至13日每天谈论都是：总理，总理。为了赶上追悼会，我虽然仍在病中，但一定要赶回北京。14日阴沉沉，许多人带着白花、黑纱，手持总理遗像，向周总理致哀，整个城市死一般地沉静。15日厂里举办追悼会，哭声一片。天安门广场数十万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自发地形成大会堂内追悼会的外场。

17日晚下班后去天安门，上下班过路或专门绕道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下车仰望烈士碑，拖着沉重脚步缓缓地走过。我八点多依依离去，刚走到广场边，又看到十几个小学生举着小花圈来到广场。

当你走在烈士墓前，借着月光看到无数洁白的花圈，读着“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想念您啊，总理！”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呢？

天已渐暗，人流依然源源不断。

17日下班后和同事又去广场。18日收到外地同学的来信，要总理遗像，同一天看到2月16日《天津日报》上“邓小平念悼词”用的是“念”，不是“致”！2月13日《河北日报》，2月17日《人民日报》3月5日与3月25日《文汇报》……。

4月3日，下着毛毛雨，随着广播器材厂花圈的队伍走了一条街，花圈太大太高，队伍太长，街上走着的，骑车的，大都停下来目送着，许多人加入了队伍。沿途汽车也放慢速度，车上车下相互呼应。

4月4日至4月7日每天去天安门扫墓。

7日晚，风云突变……上午工厂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支持关于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的两项决议。我没去，站在11层楼的窗口目送着这支队伍，这就是前几天送花圈的队伍，不禁感慨。（以上都是狱中回忆）

大约八点多钟，突然门下方离地面大约40公分的小方口像是照快门似的，“咔嚓”一声打开了，伸进来两只手，捧着两个窝窝头，一碗汤。我对着这个“镜头”，看了好一会儿

才走过去，接过来。不禁感到一阵酸楚，淌着泪啃了几口窝窝头，从黑乎乎的菜汤里捞出仅有的几片菜叶，汤喝了一口，又吐了，太咸！

何时吃午饭，午饭能送些什么来？米饭，馒头？有肉吗？放下早晨的饭碗就盼望着不管是什么样的午饭了。等啊，等啊，十二点过了，饿得发慌。眼睛盯着门下方的小方口，怎么还不打开？一点多了，恍然大悟，监狱里可能一天只有两顿饭。从此，生物钟得重新调整了。应该说，一切都变了。

从4月15日广播事业局的卢杰告诉我，我给他的“总理遗言”被查获起，日子就没有平静过。特别是4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毛某来厂保卫组之后，我的前途阴云密布。来不及与给我“遗言”的同学联系上，此时信也不敢写了。不知道是谁给他的，他是否能讲出来。如果不能的话，不知他会有何遭遇，还是我来承担吧。

那些日子，天天提心吊胆。宿舍楼道有点动静就以为是来抓我的，走路总觉得有人在跟踪，度日如年，很难熬。而今天把我抓起来关到监狱，却有如释重负之感，此时此刻反倒很轻松。

没睡好，没吃饱，躺在地上，两眼看着这个空荡荡的牢房，大小与我宿舍差不多。当目光扫到门上时，突然发现门上方的狭窄开口露着两只眼睛，分明是在监视我。出于反感，我也睁大眼睛盯着他。不一会外边的眼睛不见了，放下来一个小布帘。随即开了门，进来一个高高的汉子，我想这就是小说中的看守吧。他喊我坐起来，不要躺着。

“我头晕，坐不起来。”我依然躺着。

“怎么会头晕？”

“没睡好觉。”

“干嘛没睡好觉？”

问得太无厘头了，我没再搭茬儿。他也没强行把我拉起来，关门走了。

这一天，头重，腹空，昏沉沉，软绵绵，思绪万千。

四、第二次审讯

下午4点钟，楼道里传来送饭声，太好了，这次管它是什么，一定吃个净光。但是很不幸，偏偏这个时候又被带去传讯。我好生气！嘴上不说，肚子咕噜咕噜叫。

这次换了个审讯室。上次与我口角的女警不在了，只剩下那位比较温和的。不禁在想：毛某是怎样一个人？他把我关进监狱，可是他隐约有点关照我。他分明看得出那位女警对我态度不好，我对她也很反感，今天她就被撤下去了。毛某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这样？走进审讯室，还没等我坐定，毛某就发问。积蓄一天的委屈、愤懑，乃至反抗情绪正待发泄，我一言不发，侧过身去，面对墙坐着，不停地流泪。

“你哭什么？哭能解决问题？还是回答问题吧。”毛说。

“请让我平静下来再说！”我依然侧着身。终于控制住自己，擦干了眼泪，愤愤地反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对待我！”

“怎么对你了？”毛问。

“无产阶级专政专到我头上来了！”

“还没有对你专政呢，没有对你怎么着么。你怎么会这么想？”他态度并不坏。

“没想到这里会这么冷，这么脏。”停了一会又加了一句“也不知道一天才两顿饭。”情不自禁又落了泪。

“来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定，你还想像家里一样暖暖和和，一日三餐，细米白面？这里有这里的规定，在这里住一天就得按这里的规定办。你受不了了，想回去，那就尽快说清楚。今天说了，今天就放你回去。”

“我已经说清楚了。你们相信就放我走。”

“你讲的不是实话。”

“你们不相信那就关着吧，等到谣言制造者抓出来那天再放我好了。”

“你要听清楚，你一天不说实话，一天就不放你走，你就得在这儿关着。”

“我知道。随你们便吧。”

“你说，你的那份到底是哪儿来的？”

“北广阅览室。”我说时毛某又让女警记录。

“什么时间拣的？”

“3月5日。”

“那你为什么原来说是在火车站拣的呢？”

“撒谎没经验！”我不耐烦了。

“到底是北广阅览室还是火车站？”

“北广阅览室。”

“现在你还改不改口？”

“不改了。”

“你就一口咬定是北广阅览室了？”

“是的。”

“到底是不是？”

“是，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再改口了。”

“我们在北广也查到一份，可是和你的那份不一样。”

“我知道不一样，一样的话，早就两股并一股去了。”

“什么意思？”

“比如说张三的一份被查到，他交待是李四给他的。虽然我的那份不是张三给的，我也不用编这儿、编那儿了，就说也是张三给我的不就结了么。”

“你这样态度就不好了。”他是很平和地说的。

“你们不就是要抓谣言制造者么。”

“阅览室那么多人，怎么别人没拣到，就你拣到了？”

“该着我倒霉。”

“你若还不说，就只好还在这里关着了。”

“随您便吧。”我已经认命。

“你一共传抄了几份？”他没有训斥而是换了个话题。

“四五份吧。”

“但是，在厂里我们又发现了两份，都说也是你给的，怎么回事？”

“那有可能，有几份可能是他们从我抽屉里拿的。我办公桌的抽屉从来不锁。”

“你发现抽屉里少了，没有追问？”

“没有，我不会追问的。我没有的话，看到了也会拿的。”

“你的问题严重了。”

“我知道。”

他又反复问我遗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详细询问北广阅览室的情景，拣到的那份什么纸，什么字等等，还不时地提醒女警记录。很明显他是在走过场，我俩分明都在演戏。我是演给他的，可是他是演给谁的呢？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真劳神。最后，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五、开始了狱中生活

从审讯室到我住的牢房，途经院子时我稍稍注意看了看，很冷清，空旷旷的。牢房大楼里很特别，中间的庭很大，楼道成放射状。前边有人带路，我有意走得很慢。在穿过楼道时，看到一个牢房的门打开着，房内的人满满的，地铺从墙的一边排到另一边。看守从牢房内提出来一个水桶，接着又拿出来许多碗筷。我心想，这屋子里的人竟喝了一桶菜汤。

回到我的牢房门前，抬头一看12号。刚走进去就有人送来晚饭。这次是进来个人，而不是从门洞伸进来的手。依然是两个窝窝头，一碗汤。不过这次菜很多，而且不咸；只是一滴油也没有，吃起来很涩。我饿得慌，吃了整整一个窝头，我对他们说，剩下的那个给别的犯人吧。因为我听到过旁边的牢房因为别人吃了他的窝窝头而大喊大叫。

饭后不久门下方的小孔又开了，送进来一份报纸。好高兴啊，爬起来没穿鞋便跑过去取，打开一看是5月5日的《人民日报》，就两版，只有梁效的文章《大造革命舆论》，真倒胃口！丢在一边，便躺下睡觉。

“还不到七点钟就睡。起来，起来！”看守推门进来说。

我只好爬起来，强坐了一会又躺下，没多久便睡着了。虽然睡得零零碎碎，总还是做了许多梦，梦见了家里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没想到这一夜回了一趟家，可以说睡得很“甜蜜”。清晨起来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活在这个牢房里，比起广阔的外界空间是太小了，但是时间却变长了，想看书，想学习，便向看守提出要毛著。对于毛主席的著作，以前没有发表过的解放前两本和解放后三本，都通读了：而正式发表了的毛选一、二、三、四卷却没读过，现在正好补上。

新的生活开始了。看见屋内从东到西拉了一条绳子，我兴奋起来，马上起“床”，把被子凉在绳子上，一来放放味，二来晾晾干。房间里再没有别的，坐在地铺上，仰头观赏这床被子。它是黑面白里，确切地说是灰里，因为脏得已经面目全非了。噢！这里还有个图案，黑被面上用白线缝了一个“井”字。这代表什么意思？对着这口“井”，捉摸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再翻翻别处，又发现被子的一边里子拆了，棉花还算干净。这方法不错，我把另一边也给拆了，露出白棉花来，今晚脖子围的是白棉花而不是灰抹布了。太好了！真想给这床被子写首“赞美诗”。正在构思，突然发现被子上有血迹，虽然已经模糊，但分明是血迹！而且不是星星点点，而是“南北美洲”。看着这血迹，想着怎样才会流血，以及流血时的情景，同时想到这被子会不会也留下我的血迹？

监狱、牢房、犯人、血迹……过去只在小说或电影里看到，现在我亲身来体验了，不禁打了个寒颤。深思良久，再也没情绪欣赏与赞美这个被子了，站起来走走吧。环顾牢房四周，这才感觉到牢房与平常人的住房不同，这里不是白石灰而是红砖墙。四周砖灰、刀痕、粉笔字……字迹大多被涂抹过。细细地看，认真地猜想。这是大自然的手笔还是犯人的佳作？看这里还留着几个字“76年1月13日”。这一天，这里一定关过一个人，他犯了什么罪？1月13日是什么日子？会不会与1月8日有什么联系？情不自禁，我也用泥灰在墙上写下了“76年5月6日”几个字。写完有种到此一游的感觉，很爽快。

今天头不太痛，而四肢倍感酸软，走走，躺躺。这里没书看，没笔写，只有用脑子想。主席讲现在阶级关系变化了，资产阶级、走资派在党内。的确监狱里关的人也变了。过去关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地、富、反、坏、右、叛徒。现在这些人放了，关起来的许多是普通老百姓。以后将怎样？不知道“总理遗言”这事会闹多大，文化大革命已近十年，事情经历得太多了，自知不会有好下场。我在这里要住多长时间，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看来我得把这牢底坐穿了。起来舒展、舒展身体吧，伸伸胳膊腿，练练自由体操。忽然想到在这里可以把辫子留起来，这个副产品不错。

在牢内转了两圈，手闲心静。粗粗草草做了个打油诗：

《牢房》

四壁砖墙，
高挂铁窗。
门上方，开狭缝，
供两只眼睛张望。
门下方，开方孔，
足够送进来
两个窝窝头、一碗汤。
谁说我没有自由？
这50立方米
任我腾空，
任我横卧。
太阳西升西落，
我自安然独坐。

当有人送早饭来时我提出要点水嗽嗽口。

“你房间不是有水吗？”门外传来的声音。这声音大大地刺痛了我。房间里的自来水管接的皮管子不是冲大便用的，我又没有杯子，难道让我把嘴对着这个皮管子用水吗？很难过，不由得心酸落泪。饭后，有人来问我要不要水喝。我的余怒未消，他们不给我嗽口水，气出不来。虽然口渴难熬，眼泪不能济渴，我还是毅然地回了一句“不喝！”

这一天和水较了一天劲，想着《上甘岭》里的镜头，不时地也吧嗒、吧嗒嘴。几次想“报告班长”，但是控制着，自尊不要我开口。体验到渴死人比饿死人可能来得更容易。下午实在熬不住，便对着冲大便的皮管子，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倒也痛快。

六、第三次审讯

下午四点钟又被提审。这次我没有抗议，没等毛某提问便先开口：“今天我算是明白了您昨天说还没有对我进行专政的实情了。”

“怎么讲？”

“第一，昨天我看到了别的房间里是四、五个人一屋，而我是一个人一间。第二，我听到斜对面的脚镣声。第三，看到了我被子上的血迹。而这些还没有加在我头上。”

“你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不要有别的什么想法。”

“不会的。我想这些人也许是杀人犯，也许是投敌叛国分子，大概不会轮到我。我相信党的政策。但是，同时我想说，如果这些加到我……”

“如果对你这样的话，你会更加不说实话了，是吧？”没等我说完，毛就接了。

“是的！不必浪费时间了，我已经讲过了。你们相信就放我出去；不相信，那就关着吧。不过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想看书。我对自己身体、生命毫不怜惜。但我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活一天想学习一天，增长点为人民服务的知识与本领。希望给我毛选一卷。”他没接我的茬儿，还是追问我“遗言”的来源。接着很诚恳地问：“你为什么不讲出真实来源呢？你的想法很不能让人理解。奇怪得很，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这样下去，怎么能放你出去呢？”

我都懒得回答了。他接着问：“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讲是在保卫总理？”

“那您的意思是进行追查，以及你们认为交待清楚的人就都是反总理的啰？”我反问

他。

“不是。”片刻后，他很认真地说：“在你们工厂里你说，对于总理的逝世你感到很悲痛，你十分怀念总理。我也说了，不仅你一个人怀念总理，全国人民都十分怀念总理。我不是这么说的？”

“如果不是您这么说，我还不跟您说几句实话呢。”他主动又提对总理的怀念，我也直言不讳。

“你的问题复杂了，你要老老实实呆在这里。”

“我很老实。昨天饿了一天，今天渴了一天，我都没有报告班长。”

“你可以报告嘛，你可以要水嘛。”

“我才不去要呢！”

“为什么？”

“今天我想嗽嗽口要点水，要个碗用一用，他们都不肯。我不会向你们乞求，渴不死人。”

“嗽口，又不是什么大事，可嗽可不嗽嘛。”接着他转了话题。问：“你想出去吗？”

“想。”

“那你就说清楚。”

“我说清楚了。”

“你是宁可在这里不好受，也不说了？”

“是的。”

“你一口咬定是在北广阅览室拣的？”

“对。”

“究竟是不是在那儿拣的？”

“是。”

“那你只好还在这里关着了。”

“我知道。”

七、宣布让我出狱

回到12号牢房，吃了半个窝窝头，那个女陪审员又来问问题，都是有关阅览室的。我回答得有些不耐烦。她走时我又叮嘱她要书。几分钟后她转回来叫我去，并问我房间有没有自己的东西，看来是要把我转移到条件恶劣的地方，现在要开始对我施行谁知道是哪家的专政了。

我就像电影里走向刑场的人一样泰然走出，目不斜视，昂首阔步回到那个第34室。

“对你的传讯，服不服？”毛的提问，令人摸不着边际。

“不服。”

“你在工厂里没说老实话，才把你弄到这里来，你是在这儿交待的阅览室。”

听他这么说，我楞了。他是想认可我现在说的了？这出戏要转场了？

“到底是车站还是阅览室？”停顿片刻后他又问。

“阅览室。”我还没有完全搞懂。

“关你服不服？”

“服。”顺水推舟，我改了口。

“你说政府不相信你？还是相信你的嘛。暂时相信你，先放你回去，因为考虑到你身体确实不好，另外种种考虑吧。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以后向你们厂保卫组谈。你的事没完。”他说完，见我有些鄂然，又加了一句：“你走吧。”

此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慢腾腾地跟着女警走。走到“王八厅”时，看到那边好几个人在商量着什么，突然都转脸看着我。那个女警也停下了脚步，莫非有变故？此时毛某发问：

“你带钱和粮票没有？”

“没有。”心想这是哪跟哪啊？看他们面面相觑，便镇定地，干脆利索地抬起头说：

“我不需要钱和粮票。”

“那你就走吧。”

还没有完全搞明白，就已经被那位女警带到了监狱大门口，她只说了一句话：“出去后要是胡说八道的话，反映过来有你好受的。”我当时只是在想：你们用轿车接的我，怎么不用轿车送我呀？

出了大门，立即回首看看门牌，“炮局21号”。从来没听说过这地方，不知道是在北京的东南西北。什么也不想了，见路便走，越走越快，好像恐怕被他们再把我抓回去似的。

八、走出了炮局监狱

当走到大马路时，认出这是每天上下班的街道，步子慢下来。不知道后面是否有人跟踪，路上的人肯定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头发蓬乱，眼睛红肿，脸色焦黄，衣裳脏旧，步履缓慢。这些，路人都看得见，而我的内心却无人知晓。

虽然只关了两天，但当我来到人世间，走在路上，感觉似乎过了一个世纪。

今天的太阳显得格外柔和，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还迟迟不落。我看着她，朝她走去，开始感觉一步步接近，却越来越远。当快到宿舍时，她已经落幕了。

从此我变了。过去的我，天真浪漫，无忧无虑，充分享受着革命先辈为我们创造的一切。而今天，我在北京市公安局挂了号，那个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公章的传讯证上有“刘××”三个字，毛某在抓我那天晚上说最后还要我在上面签字。但是出来时他没提这事。他说暂时放我，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抓我进去，那时再签不迟吧。想着想着，加快了脚步。我的出来是暂时的，因此，这时间是十分宝贵的。

走过雍和宫大街、地坛公园、穿过安定门外大街、过青年湖公园、柳荫公园、黄寺大街、最后到了德外北郊市场。七点多回到宿舍。一进屋便倒在床上哭了，好伤心啊！这个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不过很快便起身拿暖瓶去打水，渴死了。水，现在是我的第一需求。虚弱的身体感觉这壶水提起来很吃力，摇摇晃晃走出走回。这个晚上喝了一壶水。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在轿车里，一会在牢房，一会在审讯室；广场，监狱；毛某，女警，看守？？反反复复出现，这一宿还不如在牢房的一夜。

（未完待续）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